

# 产教融合视域下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培养路径探索——以济南市为例

■ 陈克克<sup>1</sup> 王哲<sup>1</sup> 冯立业<sup>2</sup> 郭晓东<sup>2</sup> 鲍一丰<sup>2</sup>

一、引言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社会生产力布局和经济结构。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人工智能不仅催生了新的产业业态,还与传统产业进行“人工智能+”融合,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与服务品质。例如,工业、农业、交通、金融、医疗、教育、政务等领域,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已取得显著成效。人工智能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的同时,也成为相关领域产业人才培养新的增长点。

二、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培养的产教融合政策背景

为应对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产教融合相关政策文件,旨在引导和支持高等学校优化调整人才培养模式,有效提升教育链对接服务产业链的能力。各地也根据地方实际陆续出台配套政策。

(一)国家层面政策  
2018年教育部提出的“新工科”建设,明确了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工科人才的目标。“新工科”建设强调高校应结合产业需求,调整专业设置,优化课程体系与实践平台建设,以缩小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的差距。在2018年教育部认定的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中,就包括了人工智能类项目群。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20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等政策文件,提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向,支持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过程,并细化了产教融合的具体路径。例如,推动院校与企业共建实训基地、产业学院,推行“校企订单班”“现代学徒制”“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和“二、济南市支持政策

《济南市新一代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6年)》提出:“建设人工智能人才高地。通过人才引进、项目合作、企业引培等方式,吸引并集聚技术先进、理念前沿、能力突出的人工智能领域高端人才。支持开展产学研合作,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设立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建设人工智能综合人才培养基地、实训基地。支持校企合作,开展人工智能培训师、算法工程师、运维工程师等技术、技能人才培训。”文件明确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方向。

三、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人才供需情况

济南市作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和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工业互联网建设示范区“三区叠加”城市,目前已将人工智能产业列为13条标志性产业链之一,人工智能产业和人才需求发展迅速。

(一)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情况  
数据显示,济南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2023年达385亿元;2024年达482亿元,占全国约8%,占全省约50%;2025年达600亿元,在中国经济信息社上海总部行业洞察产业数据

服务平台发布的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城市竞争力榜单上位列第十三,居北方城市第二(第一为北京);预计2026年可达800亿元。

(二)驻济院校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培养情况  
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也明显增加。目前,济南市共有26所本科院校和18所高职专科学校,近半数已开设人工智能相关专业。

在开设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院校中,部分院校已探索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进行产业人才培养。例如,山东大学(部属院校)与浪潮集团联合成立“山东大学浪潮人工智能学院”,山东女子学院(省属院校)与山东铁投科技、浪潮软件等企业共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市属院校)与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共建实训基地。从实践运行上看,这种模式是匹配供需的有效路径。

(三)存在的问题  
当前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人才需求与院校培养的专业人才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匹配差距。

缺口人才类型	具体岗位角色	缺口原因与特征
核心算法研发人才	大模型算法工程师 深度学习工程师 NLP(自然语言处理)工程师	技术门槛高。随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这类人才是破解“卡脖子”的关键,存在缺口。
具身智能人才	机器人算法 运动控制 硬件+软件复合型人才	新兴增长点。目前具身智能(如:人形机器人)成为风口,这类“软硬结合”的人才较为稀缺。
产业落地人才	人工智能产品经理 人工智能应用架构师	供需未完全匹配。企业不仅需要写代码的人,更需要懂业务、能把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到工业、医疗等具体场景的复合型人才。

从人工智能企业的需求看,急需高水平复合型人才,尤其是核心算法、具身智能等方向的高端人才。目前本地院校毕业生还不足以完全满足企业发展需求,例如,高水平硕博学历人才培养规模有限,与企业高端研发需求存在匹配差距;部分院校可能更多侧重应用层面,未完全匹配研发人才需求。

从院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实际执行看,部分院校专业课程的设置未能完全契合产业实际需求,“由校到企”适配性不够。例如,部分院校对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不足,导致学生实践能力不强;部分教学内容更新滞后,未能及时融入行业前沿技术和应用场合;部分院校为学生提供的实质性实践机会较少,校企尚缺乏可持续的合作运行机制等。

四、可供借鉴参考的国内外经验做法  
(一)德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经验  
作为工业强国,德国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

的职业教育方面采用了成熟的“双元制”模式。该模式下,明确企业与学校的人才培养权责关系及比例,通常为企业承担约70%,学校承担约30%。将学校教育与企业实践紧密结合,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需在企业中接受实践培训,并通过法律保障和政策引导,构建了系统化的产教融合体系。

例如,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DFKI)是世界上最大的非营利人工智能研究机构,成立于1988年,具有成熟且成功的运行模式。DFKI与高校建立联合实验室,将企业项目引入教学,学生参与其中,提升人工智能专业能力。

(二)我国广东省、浙江省的产教融合实践探索

广东省和浙江省在人工智能产教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广东省构建“政校企行”四方联动的合作机制,推动政府、学校、行业和企业深度合作,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适配度。政府政策支持,院校以企业项目为课堂,按照企业标准管理,涉及理论与

与实践培养、技能等级认证、相应激励措施等,有效调动了人才培养的积极性。

例如,2025年4月获批建设的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技术转移、成果转化,实现“政校企行”四方联动,目前已对接入库高质量科技成果上千项。

浙江省注重创新产教融合模式。浙江省2025年出台的《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探索人工智能人才评价新标准;推动人工智能人才流动共享;建设人工智能学院等支撑创新政策。包括: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导向,以薪酬待遇、唯破引用量、在重要开源社区的影响力贡献度、“千才/万卡级”训练经验等作为人工智能人才的重要评价依据;高校、科研院所人工智能人才到企业全职招聘,或者自主创办企业的,可同等享受企业所在地人才政策;企业人才到高

校担任产业教授的,可担任研究生第一导师;建设人工智能学院和国内人工智能产教融合平台,鼓励企业与省内高校院所合作培养人工智能复合型、实践型人才。

例如,浙江大学与行业头部企业阿里巴巴、华数等在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培养上共建实验室,包括浙江大学-阿里巴巴集团人工智能安全联合实验室、浙江大学-华数传媒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等,将企业项目引入教学、研究和实训,有效提升学生的高端理论、实践与创新力。

五、产教融合视域下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培养路径

(一)进一步完善产业人才供需对接机制  
为应对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需进一步完善产业人才供需对接机制,提升供需适配度。

可定期由政府、行业企业和院校共同参与的人工智能产业人才需求调研,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使院校培养内容更加贴近产业需求。主动对接专业学科交叉大趋势,探索“人工智能+X”的交叉融合方向,实现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宽口径、复合性匹配。一些与产业关联度低、就业质量不高的个别专业则可以撤销。

例如,可与浪潮、神思等企业深化合作,充分发挥企业优势,探索“人工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医疗”等专业方向的硕博联培,由企业专家与高校教师共同指导,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实践能力和行业适配性。再如,对于偏重人工智能应用的院校专业,则可更多聚焦于人才培养的顶岗适用度,将产业技术应用场景融入教学实训,提升适岗能力。

人才培养跟踪反馈也是重要一环。人工智能产业的技术创新迅速,应用场景持续丰富,产业调整周期短。院校定期回访用人单位,以企业需求、岗位能力为导向,持续优化培养方案,缩短人才供需差距,增强院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二)进一步完善产教融合运行机制  
进一步完善产教融合运行机制是提升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

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方面,可由校企共同设计。特别是在课程开发、实践教学等方面,由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应用场景非常丰富,在课程开发方面,可邀请浪潮、神思等企业专家参与制定课程标准,将企业实际项目转化为多样化的教学资源,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在实践实训方面,可共建能够实质性长期合作运行的人工智能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产业学院等,为学生提供真实工作环境和项目经验。目前已有驻济院校开展这方面的实践探索与实质化运行,包括部属(如山东大学)、省属(如山

东女子学院)、市属院校(如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效果良好。

在师资建设方面,可通过校企互聘,选派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提升其实践能力,或聘请企业工程师担任兼职导师,为学生传授前沿技术和行业经验,打造专兼结合、理实兼备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三)进一步完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针对企业需求与人才供给不完全匹配的问题,可进一步完善校企合作“能力导向”(区别于“唯学历导向”)培养模式,以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院校可与本地人工智能企业签订人才培养协议,企业实质性参与课程教学、实习实训和考核评价。具体而言,低年级学生通过认知实习等方式接触企业研发、制造岗位,直观感受人工智能实际应用,培养专业兴趣和职业认知。后续随着理论学习深入,可将人工智能产业实际项目的全部或其中的某一模块,转化为“项目化”“问题导向”的教学案例和课程任务,可由院校教师与企业工程师共同授课,逐步实现教学标准与行业标准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能力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高年级阶段则可根据院校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方案、学历层次的具体定位(专、本、硕、博)等,以“准员工”角色进入课程学习、岗位实习、毕业设计等。

完善激励机制也是校企合作的重要一环。可探索合作设立人工智能产业基金、专项奖学金,开展人工智能学科专业类竞赛等,吸引有志于人工智能领域的优秀人才。这些提供平台和激励,使参与者享有获得感和成就感的方式,可充分激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和职业认同感,并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自主自觉地提升能力。

(四)进一步营造人工智能产业创新氛围  
为激发人工智能产业人才的创新创业活力,需进一步营造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

目前济南市人工智能产业有领军企业引领,也有中小企业协同。企业的立身之本是创新。创新意识的培育也是产教融合的重要着眼点。在常规性的创新创业教育活动之外,可联合企业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包括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室、众创空间等,合作企业不在大小,重在人工智能领域“专、精、特、新”特色。

鼓励有条件的学生团队参与校企双方的人工智能产学研合作项目,参与技术转移实践和科技成果转化,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

六、结语  
产教融合不仅可以优化地方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培养质量,而且可以为人工智能产业更好融入国家产业布局提供支持。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培养更应关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效衔接,持续优化实践路径,更好地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科研项目:2025年济南市党校(行政学院)系统计划科研项目。  
(作者单位:1.中共济南市槐荫区委党校;2.山东女子学院)

## 静态空间中的时代回响

——契诃夫《樱桃园》与老舍《茶馆》的空间叙事比较

■ 郝佳仪

在戏剧艺术的版图中,空间不仅是情节展开的物理背景,更是时代精神的凝练表达。契诃夫的《樱桃园》与老舍的《茶馆》,虽分属俄罗斯现实主义与中国现代话剧的谱系,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静态空间作为观察社会变革的窗口。樱桃园里飘荡的花瓣与茶馆中更迭的茶客,共同构成了时间停滞与历史奔流的辩证图景。本文试图揭示:两位剧作家如何通过空间的物质性承载历史的流动性?静态的舞台设计如何转化为动态的社会批判?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理解两部杰作的叙事视角,也为跨文化戏剧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阈。

一、空间叙事的共同范式  
(一)静态空间作为时间容器  
契诃夫的《樱桃园》与老舍的《茶馆》在叙事策略上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它们都将一个固定的物理空间作为戏剧展开的核心场域,通过空间的静态性来反衬外部社会的剧烈变迁。

在《樱桃园》中,那座美丽的贵族庄园始终矗立在舞台上,白色的花园、废弃的育儿室等空间元素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然而,就在这看似静止的空间里,俄罗斯社会从农奴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洪流正在悄然涌动。庄园主人的更迭、樱桃树的命运、仆从阶层的分化,都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内上演,使樱桃园成为一个观察社会转型的微观世界。

在话剧《茶馆》中,这个位于北京城的传统茶馆在三幕戏中保持着基本不变的物理格局:“莫谈国事”的标语、柜台后的老账簿等元素始终存在。然而,茶馆内部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象征意义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舍通过茶馆这个“社会显微镜”,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动荡的半个世纪浓缩在一个固定的空间内。

两位作家对空间功能的处理都体现了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契诃夫让樱桃园从贵族的精神领地转变为资产阶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这一转变不仅象征着俄罗斯贵族阶层的没落,更揭示了资本力量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侵蚀。同样地,老舍让茶馆从繁荣的社交中心沦为被强占的“联合公寓”,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传统市民社会的瓦解,也暗示了国家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建筑空间的命运往往最能直观地反映社会关系的重组和文化价值的更迭。契诃夫和老舍都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通过空间的物质性变化来隐喻精神的流变,使静态的舞台空间获得了动态的历史深度。

(二)空间象征与社会寓言  
契诃夫的《樱桃园》与老舍的《茶馆》在空间象征体系的构建上展现出东西方戏剧美学的深刻差异,却又殊途同归地完成了对社会转型期的寓言式书写。

樱桃园作为俄罗斯贵族文化的最后堡垒,其命运轨迹极具悲剧色彩。从第一幕春日里“整个花园都是白色的”诗意景象,到第四幕秋日里传来的“斧头砍伐树木的声音”,这个曾经优雅从容的空间最终被资本逻辑所吞噬。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对这场变革采取了暧昧态度——他既通过特罗菲莫夫之口批判贵族的腐朽,又借柳芭芙的眼泪表达对往昔的眷恋。这种矛盾心理外化为樱桃园意象的双重性:它既是需要被破除的旧秩序枷锁,又是值得缅怀的文化记忆载体。

老舍对裕泰茶馆的象征化处理则呈现出更为鲜明的社会批判锋芒。《茶馆》用三幕戏剧“埋葬三个时代”:康有为主张超新运动失败后的戊戌政变;袁世凯死后中国军阀混战内战的时候;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和美国兵在北京横行的时候。1958年5月,老舍在答复《茶馆》的写作过程时,曾经指出:“一个大茶馆是一个小社会。这出

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

在“茶馆”这个小小的生存空间和秩序背后,是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墙上的“莫谈国事”的装饰显示出浓厚的政治性,民众的言论自由一再受到压制。“改良”在政治斗争中不断地妥协,最终旧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体系崩塌,新的社会和文化空间到来,这就是“茶馆”背后更为深厚的政治文化意蕴。

(三)人物与空间的共生关系  
费尔斯与王利发这两个跨越时空的戏剧形象,虽然文化背景迥异,却都承载着相似的象征功能——他们既是物理空间的守护者,更是时代精神的守夜人。费尔斯这个87岁的老仆人,其存在本身就是一部活的俄罗斯农奴制史。他穿着过时的燕尾服,念叨着“往昔好时光”的咒语,甚至在解放后依然自愿侍奉主人,这种顽固的忠诚恰恰暴露了农奴制最残酷的精神奴役。契诃夫以戏剧的反讽,让这个最该痛恨旧制度的人成为旧制度最虔诚的信徒。当那部生命结束时,费尔斯被遗忘在锁闭的园地里,他全部“生命就要过去了,可我好象还没有生活过”的独白,不仅是个体的悲鸣,更是整个农奴制俄罗斯的墓志铭。

相比之下,王利发这个茶馆掌柜的形象则展现出更为复杂的现代性困境。王利发始终在积极“改良”——从清末添评书、民初招请转到后想尽力维持经营,他的每一次调整都是小市民在时代夹缝中求存的生动写照。老舍通过这个角色的“适应性变异”,精准捕捉了中国传统市民阶层在现代转型中的尴尬处境。王利发的精明世故与费尔斯的老迈昏聩形成鲜明对比,但最终他们都无法逃脱被新时代抛弃的命运。当第三幕中走投无路的王掌柜选择在茶馆上吊时,这个极具象征意味的自杀场景,不仅宣告了一个奋斗失败的失败,更标志着中国传统市民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的彻底崩溃。

二、空间叙事的差异比较  
(一)时间结构的处理  
契诃夫在《樱桃园》中对时间的处理,摒弃了传统戏剧依靠激烈冲突推进情节的模式,转而采用一种近乎静态的“心理时间”叙事。契诃夫通过一系列看似琐碎的细节来暗示时间的流逝,例如第二幕远处传来的“琴弦突然断裂的闷响”,既象征着贵族优雅生活的脆弱,又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社会断裂。同时,剧中人物对时间的态度极具反讽意味:加耶夫总是念叨着台球术语来逃避现实,而年轻的安妮亚则空谈着模糊的未来。这种集体性的时间感知障碍,恰恰反映了俄罗斯贵族阶层在社会转型期的精神困境。

与契诃夫的诗意朦胧形成鲜明对比,老舍在《茶馆》中构建了一套精确的历史坐标系。老舍将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浓缩在三个精心选择的历史横断面中。每个横断面都像一幅工笔重彩的风俗画,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的肃杀秋日、军阀混战时期民生凋敝的酷暑,抗战胜利后希望破灭的寒冬。这种“串珠式”场景设置并非简单的时间跳跃,而是通过“每一场设置一个戏眼”的匠心布局,将历史的关键节点戏剧化。

(二)空间功能的差异  
契诃夫笔下的樱桃园是一个典型的封闭式贵族空间。在剧本中,外部世界仅以碎片化的方式渗透进来:巴黎的时尚通过柳芭芙的言谈若隐若现,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经由洛帕欣的商业计划稍露端倪。这种刻意的空间隔离造成了双重反讽——庄园里的贵族们自以为在谈论外部世界,实则沉溺在自我想象的封闭体系中。值得注意的是,庄园的封闭性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剧情推进逐渐瓦解:第一幕中还能维持体面的社交礼仪,到第四幕时

连门窗都被拆毁。这种空间完整性的溃败过程,象征着贵族阶级保护罩的碎裂,最终暴露出其对现实时的彻底无力。

相反,老舍设计的裕泰茶馆是一个极具渗透性的开放空间。这个位于北京城中心的公共场域,就像一块社会磁石,不断吸附着各色人等和历史风云。老舍刻意强化外部社会对茶馆的入侵过程:第一幕中戊戌变法的余波表现为衙役的突然抓人;第二幕军阀混战的混乱外化为大兵明火执仗的敲诈;第三幕抗战后的民生凋敝则体现为美国货泛滥、物价飞涨的市井惨状。这种叙事策略,使茶馆成为各种力量角逐的微型战场。更具深意的是空间的垂直分化:楼上的雅座与楼下的散座不仅体现阶级差异,更随着时代变迁发生功能变异——抗战后的楼上成了特务据点,这种空间结构的易主生动展现了社会结构的重组过程。

两部杰作在空间属性上的差异,折射出东西方社会转型的不同路径。契诃夫的封闭庄园暗示了俄国贵族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被动性;而老舍的开放茶馆则展现了中国市民社会在历史巨变中的韧性。这种空间隐喻的差异,使《樱桃园》更像一首贵族文明的挽歌,《茶馆》则如同一部平民社会的史诗。但两者都通过空间属性的精心设计,完成了对各自民族历史命运的深刻思考。

(三)集体空间的构建方式不同  
契诃夫的《樱桃园》在精神空间的构建上呈现出鲜明的个体化特征,通过细腻的心理刻画展现人物内心的矛盾与虚无。柳芭芙对樱桃园的眷恋不仅是一种情感依恋,更成为整个贵族阶级怀旧情结与逃避现实的象征。她沉溺于童年记忆的温柔乡中,反复提及“我小时候在这儿睡过”的温馨场景,这种对过去的执着使她完全丧失了应对现实困境的能力。

契诃夫运用独特的戏剧手法建构这种精神空间:柳芭芙撕毁巴黎来信的举动,加耶夫脱口而出的台球术语,这些细节都成为人物内心世界的物化呈现。契诃夫通过这种对个体精神困境的深入挖掘,不仅呈现了人在历史变革中的无力感,更揭示了存在本身的荒诞性。

老舍的《茶馆》则构建了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集体性精神空间,通过茶馆这一社会缩影展现出一种完整的群体心理图景。在这个空间中,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是特定社会阶层的典型代表:王利发从清末的乐观经营到最终绝望自杀的悲剧轨迹,浓缩了整个小市民阶层在时代巨轮碾压下的精神崩溃过程;常四爷“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的悲鸣,道出了正直知识分子在乱世中的精神困境。这些主要人物的精神历程与茶馆中其他各色人等的心理状态相互映照,构成了唐铁嘴的迷信愚昧、刘麻子心理的唯利是图等,共同构成了一幅旧中国市民的精神病理图谱。

三、结语  
契诃夫的《樱桃园》与老舍的《茶馆》,通过静态空间的精妙设计,完成了对社会转型的史诗性书写。樱桃园的封闭性与茶馆的渗透性,分别象征了贵族阶层的脆弱与中国市民社会的韧性;而费尔斯与王利发的悲剧命运,则成为旧秩序殉葬者的双重镜像。两部作品的差异折射出东西方社会变革的不同路径:契诃夫以诗意的忧郁凝视历史的断裂,老舍则以辛辣的写实记录时代的阵痛。然而,它们共同证明了空间叙事的强大表现力——当时间被压缩进固定的场景中,社会的本质与人的困境反而得以清晰显现。这种以空间对抗时间的艺术勇气,使《樱桃园》与《茶馆》超越了地域与时代的限制,成为人类面对历史变革时的永恒注脚。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 走向语感的小学古诗文教学

■ 崔 淼

随着国家新课程标准的深入实施,对小学生文化理解与语言素养的要求日益明确。古诗文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新课标强调,学生应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汲取民族文化智慧,同时要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这些要求不仅关注知识积累,更重视文化内化与语言运用。

然而,当前教学存在一个突出矛盾:学生背诵篇目增加,但理解与运用能力并未同步提升。这种积累与运用的脱节,影响了古诗文育人价值的实现。如何将要求背诵的文字,转化为学生动态的语言感知和文化认同?本文旨在分析主要问题,探索从浅层积累向深度内化与有效运用的改进路径。

一、当前教学中的主要问题  
(一)内容安排零散

现行教材古诗文篇目增加,但编排常呈点状分布,单元或年级间联系较弱。例如,李白《静夜思》在二年级,《枫桥夜泊》到四年级才出现。这种安排虽遵循由浅入深规律,却割裂了题材、意象的内在脉络。以“月亮”意象为例,从低年级“呼作白玉盘”,到四年级“低头思故乡”,再到高年级“把酒问青天”,其意蕴从童真、乡愁扩展到哲学追问。但这些诗句分散在不同年级,学生很难自主建立意象的演变脉络,感受到的常是一首首孤立的诗。

(二)教学过程单一

常见课堂流程多为:教师解词,学生朗读,最后以背诵默写为目标。这易将古诗文简化为记忆材料,忽视其作为语言艺术和情感载体的本质。例如,教师可花大量时间纠正“疑是地上霜”中“疑”字的字形,却只用几分钟解释为何月光被看作秋霜。学生知字义,却不解字组合何以动人;能默写“霜”,却感受不到夜的寒凉与诗人的孤寂。教学过程多为单向传递,学生忙于记标准答案,缺少形成个人理解的空间。

(三)学习效果表面

学生小学阶段能背数十首诗,积累量可观,但多处于沉睡状态。日常口语与习作中,古诗文的活化运用有限。描写春天,很少自然想起“二月春风似剪刀”;表达友谊,不会化用“不及汪伦送我情”。即使引用,也常生硬植入,缺乏融合。

二、教学改进的可行路径  
(一)注重课外的系统性

改变碎片化现状,需建立教学的系统思维。可按主题组织,如将《赠汪伦》《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德》等送别诗集中教学。学生通过比较发现:同是送别,李白与汪伦踏歌相别,与孟浩然目送孤帆,王维与元二酒泪相别。不同方式背后是不同的情感与风格,这有助于学生建立“送别诗”的认知图式。

可按作者线索组织。以李白为例,从《古朗月行》到《望庐山瀑布》,再到《早发白帝城》,引导学生发现其一以贯之的想象力与豪迈气概。学生认识的不再是孤立的诗,而是一个有血有肉、风格鲜明的诗人。

可围绕意象教学。中国古诗中“柳”“月”“酒”“雁”等意象内涵丰富,教师可围绕一个核心意象,组织不同年级、诗人的相关诗句。当学生发现“柳”出现在“碧玉

妆成一树高”“客舍青青柳色新”“羌笛何须怨杨柳”等多首诗中时,便开始理解其丰富性——它不仅是春的象征、离别的寄托或边塞的乡愁。

(二)推进理解的深度  
真正理解是能感受语言背后的情感与意境,需多元化的方法。

诵读要有感受。教师不应仅要求读准音、对节奏,更要引导以声传情。读“朝辞白帝彩云间”,声可轻快明亮,传达遇赦东归的喜悦;读“千山鸟飞绝”,声可低沉缓慢,表现天地孤寂。当学生能用恰当语气、语调诵读时,已开始理解诗歌的情感基调。

想象是桥梁。古诗语言凝练,留白多。教《望庐山瀑布》,可引导学生闭眼倾听,脑中构建画面:紫烟如何缭绕,瀑布如何如银河垂落,水声如何轰鸣。再请学生用自己的话描述画面,比较谁更贴近诗意。这能将抽象文字转化为具体形象,帮助学生真正“看见”诗歌。

联系生活是关键。学生学古诗远,常因觉其已无关。教师要寻找古诗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学《游子吟》,可请学生观察母亲准备早餐、整理书包的细节,体会“临行密密缝”中平凡而深厚的母爱;学《悯农》,可结合节约粮食主题,让学生理解“粒粒皆辛苦”不仅是古代农民的写照,也关乎今天的资源珍惜。当古诗与生活经验共鸣,理解便不再是外部知识获取,而是在情感认同。

(三)加强表达的引导  
积累和理解的最终目的是运用。要让古诗文成为学生语言能力的一部分,需搭建从理解到表达的桥梁。

情境化运用是最自然的引导。教师可设计真实或模拟的情境,让学生自然想起并运用诗句。校园樱花开了,问:“见此景,你会想起哪句诗?”同学转学离开,可引导在送别卡片上写合适的送别诗。这能将诗句从课本解放,成为学生表达当下感受的可选方式。

仿写是学习语言的有效途径。从简单替换开始,如改“春眠不觉晓”为“夏眠不觉晓”,体会原诗“春”字的特定感受;逐步到句式模仿,如学“两个黄鹂鸣翠柳”的结构,尝试描写其他场景;再到意境模仿,如学《江雪》的对比手法,尝试写热闹集市。通过循序渐进的仿写,学生可逐渐熟悉古诗的语言特点。

鼓励化用与创作。对高年级学生,可鼓励将古诗文元素融入自身表达。写春天的作文,可尝试用“东风拂面,冰雪消融,大地苏醒”这样文辞色彩鲜活的开头;描述友谊,可化用“桃花潭水”的意象;更进一步,可尝试创作简短的古体诗或现代诗,不苛求格律,重在表达真实感受。当学生写下“校园樱花香,秋日读书忙”时,已开始将古诗文语言内化为自己的语感。

古诗文教学不应止于积累,而应走向语感的培养。通过系统积累、深度理解与有效表达的结合,学生不仅能背诵,更能感受其情、理解其文、运用其言。如此,古诗文才能真正融入学生的精神世界,成为其文化认同与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金项目:吉林省课程理论思政示范课程资助项目“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项目编号:KCSZ2509)。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